

明

唐元鹏

海上飞白·英雄末路：  
汪原廷斯战争重压下，  
明帝国的生死棋局

# 熊廷弼之死

晚明政局的因徒困境

海上飞白

明史研究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熊廷弼  
一  
書以志  
成六日

# 版权信息

书名：熊廷弼之死：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

作者：唐元鹏

出版社：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

出版时间：2023-06-01

ISBN：9787218160160

品牌方：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

---

本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进行制作与发行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# 自序

这本小书的缘起，来自我对晚明历史的特殊爱好。年轻时每读到甲申之变时，都不免感叹——朝代兴亡，尽是生灵涂炭，总让人有说不出的心痛。我想知道，历史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。

在晚明历史的传统叙事中，有两位名将是绕不开的——熊廷弼、袁崇焕。他们苦苦支撑了辽东防线最后的光景，却都没能成功抵御敌军，被朝廷判死刑。熊廷弼传首九边，袁崇焕被凌迟处死，下场极为惨烈。

熊、袁二人，都身具名将光环。可能我是个很拧巴的人，对于大家都这么认为的史实，偏要再仔细调查清楚，看看历史是否的确如此。这便是写这本小书的初衷。

结果，翻阅史料，不见熊廷弼亲自部署指挥过一场战斗、战役，真正的指挥者都是他手下的总兵、副将、参将……熊廷弼本人所做的，不过是拟定攻守大战略，催粮催饷，为军事将领们补充兵员装备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所谓“名将”就是个“后勤大总管”！

另外，熊廷弼的死也是我非常关注的历史事件。他到底因何而死？为什么在万历年间顺风顺水的熊廷弼，到了天启年间竟然会处处遭受掣肘，在近乎被架空的情况下，仍然要对一场巨大的失败负责，最后走上了断头台？

至于熊廷弼到底是死于阉党还是死于东林党之手，一直争议颇多。但经过深入查阅史料，我发现可能大家都想多了，熊廷弼的死既不是因为阉党构陷，也不是因为东林党抛弃，而是另有“主谋”。

一路的探索，还让我关注到许多过去很好奇，却始终不甚了了的问题：明军战斗力到底如何，能否与后金八旗军在战场上一较高下？熊廷弼如果不死，能否稳定辽东局势，避免清兵入关？大明朝有没有

可能在保持辽东防线的情况下，避免随后发生的李自成、张献忠起义？

在尽力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，我又意外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——大明朝的囚徒困境。在君臣之间形成的囚徒困境，大大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组织能力。在一次又一次的君臣斗法、派系斗争中，明朝始终无法进入能挽救国家于生死关头的军事动员体制，从而走向了躲不开的崇祯朝死局。

总之，我不自量力地希望以历史非虚构写作将熊廷弼下半生，也就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呈现于斯，使公众可以从小小的切面中，感受大明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

研究历史，我不过是半路出家，属于人们常说的“票友”，在写这本书之前，甚至没有完成过一篇历史专业论文。本人水平有限，这部作品难免挂一漏万，恳请师友、读者们以批判的眼光阅读，不吝批评指正，纠错补缺。

在写作过程中，我衷心感谢许多师友的支持与帮助。樊树志老先生对我曾有一字之教；杨津涛、王戡、李夏恩、陈曦、石巍等几位好友，为我提供了宝贵史料，并一直给我鼓励、批评与指正；本书还承蒙肖风华先生青睐，他鼓励我完成了一度有些后继乏力的写作；感谢施勇、陈畅涌、张崇静、梁欣彤、江艺鹏几位编辑老师认真负责的审阅，他们提供了具有极高专业水准的修改意见。

最后，感谢当年培养我胡乱读书的父母，特别感谢妻子一直以来的理解与帮助，还有小女时隐时现的鞭策，你们都是我写作的力量源泉。

唐元鹏

2023年1月于家中

# 引子

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八月二十六日，北京西四牌楼附近人山人海。这一天，西市又要杀人了，而且杀的人还是朝廷高官。

囚车远远行来，车上坐着一位身材魁梧、面色从容的中年男子。来者就是今日受刑之人——前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、辽东经略熊廷弼。

他的罪名有两个：一是任职期间丢失广宁，败坏辽东战局；二是待罪之中仍贿赂东林党，以图脱死。

熊廷弼被押下囚车，走上断头台，刽子手强压着昂首挺立的熊廷弼跪下。午时三刻，验明正身——熊廷弼，字飞百，号芝冈，湖广江夏人，时年56岁。监斩官在他名字上勾上红圈，将令牌扔入场中。

一声“开斩”，刽子手手起刀落，但竟然没有一刀把脖子砍断，只能以刀为锯反复切割，方才把熊廷弼的头割下，场面惨不忍睹。显然，刽子手受人指使，要熊廷弼到死还受罪。

随后，熊廷弼的无头尸体被弃市，首级被放入木盒之内，快马传首九边，以儆效尤。

此时，距离广宁失陷已经过去3年，距离熊廷弼首度经略辽东过去了6年，大明与努尔哈赤的辽东战争业已进入第7个年头。

大明帝国经历了萨尔浒大战、辽沈失陷、广宁失守三场大败，损失兵马几十万，损失钱粮上千万。辽东的边境战争，正将帝国拖入经济破产、社会骚动的巨大危机之中，这场危机深入每个人的灵魂深处。

熊廷弼，是大明朝对抗后金军的名将，前继萨尔浒惨败，后启袁崇焕。假如熊廷弼不死，他能否力挽狂澜，逆转大明在辽东战争中的败局？

遥想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，皇帝拜将之时，赐熊廷弼敕书一道、尚方剑一把，副总兵而下（含）允其先斩后奏，除此之外，还赐给熊廷弼大红麒麟一品官服、纁丝4表里、银50两，并赐宴都城外，五府、戎政、部院堂上掌印官陪宴饯行。昔日，恩宠无以复加；今日，下场如此凄惨。

熊廷弼之死，牵扯了天启皇帝、魏忠贤、叶向高、孙承宗、杨涟、左光斗等人的恩怨情仇，触发了天启年间朝堂之中无人能逃的血腥党争。那么，在这场最终导致东林党、阉党湮灭的重大历史事件中，熊廷弼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

想要回答这一切，必须把时钟拨回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从熊廷弼升任御史的时刻说起……

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八月初一，大明帝国如同往年一样，在平静中度过。唯一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天晚上，人们在南阳的夜空中看到一颗苍白的彗星，由西南向西北划过天际。彗星在那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民间通常把它称为“扫帚星”。

大明的天空出现扫帚星，自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。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给万历皇帝上了一封奏疏说：我朝200多年，彗星只见过17次，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，我看它从西南向西北，莫非西北要出事情？

与此同时，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位德国人也看到了这颗彗星，他叫开普勒。但，无论宋一韩还是开普勒都不知道这颗彗星是怎么回事，直到100年后，一位叫哈雷的英国人才发表了论文，推测地球人每隔76年会看到这颗彗星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三月，彗星“如约而至”，它就是如今大家都知道的哈雷彗星。

宋一韩不是天文学家，他关注的不是这彗星什么时候出现。古代臣子借着天象说事，是常规操作，而且多数要对朝政说三道四，甚至是要吐槽皇帝的。果然，宋一韩借此事向万历皇帝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筐车轱辘话，最后把话题引到了税监问题上。

他大骂万历皇帝派往全国各地的收税太监，从广东的李凤到江西的潘相，从天津的马堂再到张焯、胡滨之流，说：正是因为这些没根的小人在地方横征暴敛、鱼肉百姓，才导致彗星出现，这是上天对皇上您的警示啊。

显然，从彗星到西北国防，再到税监问题，这则奏疏没有逻辑可言。但万历皇帝也不生气，只是把奏疏留中不发，也就是压在宫里不闻不问——这是过去几十年里，这位皇帝与各路文官打交道的惯用手段。

在奏疏中，宋一韩提到一个名字——高淮，万历皇帝派往辽东的收税太监。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，他将在之后的一年，持续搅动大明的朝局。

这个看上去平静的帝国，实际上暗流汹涌。八月初六，万历皇帝批了太仆寺10万两银子以赈济京城及北直隶灾荒；八月十三，他又批示把30万两太仆寺的银子借给户部，以解边关饷银燃眉之急。

一边灾荒，一边边关闹饷，都是让万历皇帝非常郁闷的事，偏偏此时太仆寺少卿李思孝又给他送上一封更为闹心的奏疏，说帝国的钱库在万历爷爷嘉靖、老爹隆庆时还有1000多万两的存款，可是这几十年下来，又是打仗，又是办皇家婚礼，存款只剩27万两银子。

简而言之——大明朝没钱了。

负能量接踵而来。只隔了一天，陕西就发生了地震；接连几天，帝国各地官员又报告看到了扫帚星。扫帚星久久不愿离开人们的视野，看来灾祸不会小。

遇上扫帚星和地震同时出现，自诩胸怀天下的文官们，怎么可能不说道说道。官员们纷纷上疏，在他们眼里，朝政这也不好，那也不是。万历皇帝除了把这些硃硬人的奏疏——留中之外，也别无他法。

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的八月就这么乱哄哄地你方唱罢我方登场，但这个月也并非都是负面新闻。

八月初三，就在宋一韩酝酿着满腔为民请命的浩然之气，奋笔疾书的时候，大明吏部和都察院通过了官员考选的榜单，总共有42人将被委以科道言官的重任。

这些人里，有未来官至左都御史、吏部尚书的房壮丽，有做到两广总督的何士晋，官至巡抚的也有好几位。其中还有一位未来将在这个帝国国防大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——熊廷弼。这一年他不过39岁，刚在工部主事上干满3年。这3年里，他勤勤恳恳地参与修复三大殿的工程，想必也因此得到了皇帝的赏识。在熊廷弼之后紧接着一个名字——荆养乔。5年之后，熊廷弼与荆养乔将会发生激烈的交锋。只是此时他们不过是都察院候补官员，正期待着巡按御史这个品级不高，却又极其重要的职位。

大规模外放御史可能是这个八月唯一的好消息。若干年来，这位脚有残疾、走路不利索，特别不爱上班的万历皇帝终于不再放任官员的空缺。但这些即将出发的八府巡按们，面临的却是一个看似平静无波，实际上暗流涌动的帝国。

# 第一章 高淮乱辽，砥石破茧

在明朝的公文系统里，辽东有个建州女真的部落酋长叫“奴儿哈赤”，他在大明藩国朝鲜的公文中叫“老乙可赤”，明朝与朝鲜又时常将他蔑称为“奴酋”“老贼”“老酋”，而在现代史书里，他是“努尔哈赤”。无论怎么称呼，他都是晚明无法绕过的名字。

在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努尔哈赤还非常低调，甚至整整一年，《明实录》中都看不到他的名字。但对与建州女真隔着鸭绿江相望的朝鲜来说，努尔哈赤就没那么安静了。在这一年里，“老乙可赤”“老贼”“老酋”的消息几乎每个月都出现在朝鲜的公文系统中。

二月，努尔哈赤派了3名使者前往朝鲜，说他本来是蒙古人后代，向往中国文化，而布哈泰是坏人，杀掠周围的部落，所以他起兵讨伐他们，也是为了帮助朝鲜消除威胁。

为何努尔哈赤要向朝鲜说这么一番话？布哈泰是什么人？努尔哈赤又为什么要讨伐他呢？

努尔哈赤所言的讨伐布哈泰，是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一月，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乌拉部之间的一场部落战争。双方在乌碣岩大战一场，三千建州女真兵马大破一万乌拉军，斩杀了乌拉三千余众，得马匹五千、甲冑三千，大获全胜。布哈泰就是乌拉部的酋长。乌拉部，就是日后经常出现在清宫后妃名字里的乌拉那拉氏的母族。

这只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的战争中不太起眼的一场，但已经把一衣带水的朝鲜吓得不敢轻举妄动。

努尔哈赤率获胜之军绕道朝鲜庆源城返回，穿越朝鲜如入无人之境。这种相当于军事游行的做法，让朝鲜上下不寒而栗，认为“老

酋”故意为之，目的是宣示武力，况且“老乙可赤”还自称“聪睿恭敬汗”，其野心不小，于是朝鲜派人向大明打了“小报告”。

此时的大明辽东边镇，并没有精力对朝鲜的“小报告”给予足够的重视，当地官员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：辽东正在被一位文官嘴里的“奸佞”祸害，即为皇上收税的太监高淮为非作歹，正在动摇帝国东北边陲的国防根基。

辽东对于大明而言是边防最前线，离京城不过千里，号称“神京左臂”。在过去200年中，辽东并不是帝国边防最要紧的地方，宣大、蓟镇这些直接拱卫京师的边镇比辽东重要多了。但是，当老旧的帝国走入万历中后期，人们就隐隐地感到辽东不安宁了，从高淮开始，一系列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危机便陆续降临边塞，辽东终将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。

就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，御史熊廷弼“空降”辽东，开启了他跌宕起伏的边塞人生。

## 一 税监高淮

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正月十五刚过，辽东巡按萧淳就把过年期间拟定的一封奏疏递到了中央。他说：辽东比邻蒙古、女真，兵凶战危，狡猾的夷人屡屡犯边，而税使高淮自从到了辽东以来，敲诈勒索，导致民不聊生，再这么任由高淮祸害下去，辽东危在旦夕。

萧淳这封奏疏，可谓刀刀见血、字字诛心，直指税收工作已经动摇了国防大业。只是这封奏疏再厉害，也敌不过皇帝打太极，万历将奏疏留中不发，萧淳也无可奈何。

接下来，官员们前赴后继对高淮展开斗争。八月有前面引子中提到的宋一韩上疏，到了十一月，则有吏科给事中姚士慎上疏，大骂高淮祸乱辽东，辽人恨不得剥他的皮，吃他的肉。

为什么大明朝堂如此多的官员对高淮恨之入骨，欲除之而后快，而万历皇帝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对文官的弹劾不闻不问，竭力保护一个太监呢？

我们再把时间拨回到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，这一年的三月，高淮奉旨去辽东收税。他年轻时是“混社会”的，在崇文门“收费站”混了个包税的工作。崇文门是大明重要的过路费征收点，万历朝每年收各色银子达68929两之多。

他的这份工作就是按照政府的定额，向来往客商、车马收过路费。通常他们不可能只按实际收取，都要再盘剥一道。

这么大的一笔寻租利益，高淮也没法独吞，留了自己的，交了集体的（“孝敬”上级），剩下的才是国家的。干了几年，高淮深深体会到收税差事的好处，寻思着找个更能牟利的路子。

正好，高淮遇到了万历皇帝最缺钱的时候，从万历二十四年也就是1596年开始，连续两年紫禁城都“被雷劈了”，乾清宫、三大殿等好几处重要宫殿都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重修紫禁城产生了上千万两银子的缺口，为了凑这笔土木预算，万历皇帝想出了一招——收矿税。

万历年间，大明朝的经济还是蛮发达的，民间手工业、商业蓬勃发展，但政府怎么就收不上税呢？比如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，大明八大征收过路费的钞关，收入从原来定额32.55万两降到了16.2299万两，而商税收入，一年只有15万两银子。在万历早期，工商业的税收全年只有94.3万两银子。

既然正常的政府系统收不上来，万历皇帝就派自己人——太监去收吧。从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开始，代表皇帝收税的太监就被派往了全国各地。所谓矿税，其实不仅仅是开矿或者冶金矿产的税，还包括各种商业杂税。

对于狠人高淮而言，机会终于来了。这时的他，已经混到了内廷十二监尚膳监的监丞，正五品的紫禁城厨房四把手。

别看高淮只是社会人出身，但他锐意创新，眼光独到地给万历皇帝算了一笔账——辽东虽然偏僻，但环境保护做得好，金山银山、人参貂皮、飞鹰马匹应有尽有，不正是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富庶之地吗？要是把税收工作搞上去，每年最少能搞到3.2万两银子，再在盖州发展资源性工业银矿，在广宁搞边境贸易马市，东北经济不就振兴了吗？

听到这番说辞，万历皇帝立马有了主意：高淮多年从事税收行业，对数目特别敏感，加上想法不错，不正是朕所需要的人吗？

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三月，经阎大经请奏推荐，皇帝下旨，派遣高淮率领阎大经等人出关开矿征税，并且亲赐“福阳店”几个大字。高淮拿到皇帝题字后，立马打出“奉谕旨征收国助”的大旗，在山海关设卡：要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

只是，高淮的买卖从他出关开始就被文官们盯着，就在皇上题字的时候，贵州道御史涂宗浚已经把高淮告到了御前。从涂宗浚开始，奉旨开店的高淮与文官们长达9年的宫斗大戏拉开了帷幕。

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二月，一场官场风暴刮过平静的万历朝堂——辽东官场变天了。二月二十五日，万历皇帝雷霆震怒，以镇守辽东总兵官马林蔑视旨意、玩忽法度的罪名罢免之，命革职闲住，永不叙用。开缺的位置，万历皇帝命有关部门赶紧推选将领继任。

圣旨一下，满朝哗然——马林被罢竟然是因为税监高淮的参劾奏疏。因为一个太监的参劾罢免了“辽东军区总司令”，这等事实在太惊人了。

弹劾武将难道不应该由文官来干吗？本着“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”的原则，“国防部”的兵科给事中侯先春，兵部职方司郎中张主

敬，员外甯时模，主事桑学夔、王惟简等官员群起上疏，为马林申辩。

三月初五，万历皇帝在看到兵部成群结队为马林求情的奏疏后，雷霆震怒，再下严旨斥责，以结党为名，办了以侯先春为首的一大串下级文官。

高准在辽期间，辽东巡按王业弘、永平府通判罗大器先后因与高准“作对”而去职。到了现在，他再来一封“小报告”，竟然把“辽东军区总司令”拉下马来。

首辅沈一贯倒也不藏着，在他的一封奏疏中把皇权与文官之间的矛盾说得明明白白：镇守太监是嘉靖皇帝罢停的制度，作为他的孙子，您要是恢复这个制度，您祖宗都不会放过您，更何况，这厮要夺兵权，到底想干什么？

沈一贯说出了文官所忌惮的核心问题：高准的官职里，第一项就是钦差镇守辽东等处，这意味着他是辽东的镇守太监。镇守太监制度，从仁宗开始到嘉靖皇帝，历时百余年，已经在嘉靖年间被废止了。万历的圣旨岂不是让文官好不容易夺过来的权力再度旁落，镇守太监死灰复燃？

这可不行。所以从高准到达辽东那一刻起，文官集团就没完没了，前赴后继地与之战斗。这场争斗注定不会停止，直到有一方倒下。

在文官奏疏里，高准在辽前后9年，其主要罪状有二：一个是放纵税吏横征暴敛，另一个是搅乱了军事指挥。

在税收业务上，高准的确非常认真，大学士朱赓的奏疏讲了这么一件事：

春间当雪深丈余人烟几断之时，（高准）带领家丁数百人，自前屯起，辽阳、镇江、金、复、海、盖一带大小城堡，无不迂回遍历，但有百金上下之家，尽行搜刮，得银不下十数万，闾阎一空。<sup>①</sup>

谁能想到这个大太监能够在春季雪深的时候，亲自带队下乡收税，难道高准是那种个人品质特别好、尽忠职守的另类？当然不是。所谓无利不起早，高准继续奉行了当初在崇文门收税的路数，在辽9年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
不仅如此，高准自己赚一分，下面的官吏也要狐假虎威再捞一分。日后熊廷弼巡按辽东，就揭发过类似的情况：游击郭济川在高准回京时，为了凑礼物，拷索手下及商人收取东珠10余颗、金子20两、丝银100两上供，自己留下绣缎4匹、绫罗2匹、杭绣6匹；守备郭巍然，当高准向他摊派财物，他就转嫁手下700余名军兵，派一收二，上缴之后，自己留下价值100两的财物。

对此，熊廷弼也认为，每年征税3万多两以致辽东民穷财尽，许多边民逃跑到“夷虏”那边，税基继续遭到破坏，边防失去民众支持就是无源之水，因此征收的税银与辽东所受损害比起来，是得不偿失的。但熊廷弼只说其一，却没有深入发掘辽东衰败的来龙去脉。

辽东的历史情况是正税越收越少。永乐年间辽东屯粮产出有70万石，朝廷只要每年支付1万两的京运年例银（每年从北京岁入中划出的边镇粮饷）就能养活军队。后来粮产一直下跌，正德年间跌到24万石，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回升到30万石，但到了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，屯粮产出又跌到了27.9万石，朝廷每年要支付京运年例银41万两填这个窟窿，这还不包括其他民运银、盐税收入。

由此可见，高准在辽东每年刮走的3万多两，很多是这些之前本来该收，却收不上来的税。那么这些该收却没收的屯粮税赋都跑哪儿去了呢？

一来就是屯地的侵占。从明朝后期开始，文武官员把屯田当成了自己的“提款机”，如嘉靖时，从镇守太监白怀、总兵麻循，到副总兵张铭、参将萧滓、分守监丞卢安、游击将军傅瀚，你占二三百顷，他占十余顷，很快屯田就被分走不少。另一个就是逃军。军户可以说是明朝最惨的人，一方面要拿起武器打仗，另一方面还要做军屯的农民，而这个“农民”还要交比普通百姓高得多的税。拿辽东军户来

说，一个军户种50亩地要缴纳余粮12石，按明朝地产平均每亩一石来算，军户近四分之一的产出要上缴。

除此以外，军户还要承担无穷无尽的徭役，如修建边墙、水利，卫所各级官员的私活也随意征调军户承担。过去军户靠家中剩余丁口做其他活计以维持生存，但军头占役以及余丁因不断被抽调入伍而减少，造成军户破产，于是受不了层层盘剥的军户开始逃亡。嘉靖时，军户不断逃回内地，而且“累经清勾，未见解报”，致使辽东“行伍日见其空”。<sup>注2</sup>

到嘉隆万年间，军屯名存实亡。隆庆年间，给事中魏时亮在奏疏中说：“盖辽之困穷极矣。自嘉靖三十八、（三十）九年间，全辽岁欠，一望绝烟，丁壮死亡，十空八九。”<sup>注3</sup>由此可见，辽东从嘉靖年间就开始破败，到万历年间已经病入膏肓。

万历面对辽东越来越少的收成，以及北京逐渐增加的京运年例银负担，自然希望高淮能给他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但高淮越“勤奋”，百姓越遭殃，或逃跑，或反抗，或认命，辽东形势只会越来越坏。这便是吴思所说的“崇祯死弯”，只是比崇祯要面对的困境提早了几十年。

对高淮的诟病，还有一条非常重的“轻启边衅，破坏战守”。前面说过，高淮以镇守太监之名插手军事，在他的报告中，多有涉及军务的内容。明朝皇帝向来有厂卫递交信息，作为了解朝野形势的补充。

镇守太监本来就有插手军事之权，面对这些文官的“诋毁”，自然不会受到皇帝的责怪。皇帝的宠信让高淮有点“飘”，他不仅在辽东刮地皮，还把手伸向了属国朝鲜。

收税就是搞钱，明末官场上，碰钱的都是美差。即使没有高淮，辽东文武贪墨的也不少，但高淮的存在严重侵害了辽东文武的灰色利益，饭碗被抢，不共戴天。

插手军事更加得罪了文武两阵营，连总兵都被他弹劾而去，那些武将固然无法安寝，文官更睡不着觉：高淮把文官的弹劾权都抢走了，以后武将还会怕文官（上贡）吗？最后高淮向朝鲜征发财物，进一步得罪了朝鲜。他一来，直接动了所有人的蛋糕，不赶走他能行吗？

当时协理京营戎政尚书李化龙惊呼：辽左危在旦夕！他认为高淮已经动摇了国防大业的根基，辽事已不可为，并进一步提出如果辽亡则京师也会受到直接威胁。

但无论文官怎么上奏，万历就是不处理，这又是为何呢？

## 二 大明朝的囚徒困境

“高淮税辽”实际上牵扯着一个纵贯大明一朝、比收税重要得多的问题——大明朝政中的各方权力，文武官员和太监都是陷入困境中的“囚徒”。

经典的“囚徒困境”是这样的——

警方逮捕甲、乙两名嫌疑犯，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有罪。于是，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，分别和二人见面，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：若一人认罪并做证检举对方（“背叛”对方），而对方保持沉默，则检举人将即时获释，沉默者将判监10年；若二人都保持沉默（互相“合作”），由于证据不足，则二人同样判监半年；若二人都互相检举（互相“背叛”），则二人同样判监5年。

这个模型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人都是利己的，都要寻求自身最大利益。

从理性分析这个模型，很明显，双方只要都保持沉默，就能得到只判半年的次好结果。但是，两人被分开囚禁时，会因无法沟通而不知道对方的选择，或者纵然可以沟通，也大概率不相信对方的选择。在此情况下，选择逻辑就会变成，只要检举对方，最差结果就是被判

5年，最好结果是无罪释放（假如对方保持沉默），但保持沉默可能获得最差结果被判10年。

这场博弈中唯一可能达到的“纳什均衡”<sup>④</sup>，就是双方参与者都背叛对方，结果二人同样服刑5年。

原来，明朝权力结构是文武相争，经过200年的斗争，文官集团已经稳占上风，帝国确立了以文驭武的原则，权力结构已经稳定下来。大部分地方的文武官员沆瀣一气，组成了利益共同体。一旦文武双方形成了互相沉默的第二种模式，要倒霉的自然就是皇帝，他立马就会成为被臣下勾结起来对抗的一方。

所以，皇帝要派出高淮，让他成为打破这潭死水的石头，让他去重构辽东的“纳什均衡”。

在辽东的新形势下，官员想要勾结太监，虽然最终他们确实做到了，但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条件。加入游戏的各方必须互相信任，但大明的文官与太监有着血海深仇，几无调和的余地，要让他们短时间内形成互信，不啻痴人说梦。

据统计，高淮在辽9年，被他弹劾去职的文武官员有5人，上至总兵巡按，下至通判同知，文武皆有。

由此可见，高淮的加入，让辽东再度形成了“囚徒困境”：高淮与文官集团互相检举揭发，让处在仲裁者位置上的皇帝重新获得了优势。

此外，在万历皇帝看来，高淮还承担着“为朕之耳目”的作用。万历皇帝庙号神宗，后人说他懒政，不爱上班，对政事全然不管。其实这位皇帝只是选择性懒惰而已，对于军国大事，他可丝毫不会放手。

在辽东军政上，除了攻击高淮、弹劾官员的奏疏，万历皇帝悉数回复。这些回复里，充满了对手下官员尸位素餐、不肯负责的不满——这些官员对军政大事模棱两可，经常延误工作，只会喊着增粮增